

明代曹钦兵变“谋反说”初探

——一个“层累造史”的典型例证

杨德会,王秀丽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明代天顺朝爆发的曹钦兵变,学界普遍将其定性为曹吉祥、曹钦叔侄的谋反行为。然而,《明英宗实录》等原始史料记载的曹钦兵变“谋反说”疑点重重。有鉴于此,明人不断对原始史料中有关曹钦兵变的记载加以改写,最终使得“谋反说”得以完善定型。因此,曹钦兵变“谋反说”可以说是“层累造史”说的一个典型案例,而明人之所以热衷于构造“谋反说”则主要是基于政治原因。

关键词:明代;曹钦兵变;“谋反说”;层累造史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5-0044-05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的“层累造史”说甫一提出,立即轰动了整个学术界,持久并且强烈地影响了此后的国史研究。90年代以来,尽管李学勤等学者开始对“层累造史”说提出挑战^[1],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学说的史学价值就此一笔抹杀。事实上,“层累造史”说不仅在阐释上古史及民俗学方面仍然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古、近古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也可以透过这一学说得到解释。举例言之,曹钦兵变的历史书写在明代的演变就可以被视为一个“层累造史”的典型例证。

明天顺五年(1461)七月二日凌晨,北京宫城长安门外,宦官曹吉祥侄子曹钦发动了一场兵变。曹钦率领变兵首先杀死锦衣卫指挥同知逯杲、左都御史寇深,继之砍伤内阁大学士李贤,然后火烧宫门。怀宁伯孙镗、兵部尚书马昂率兵平乱,曹钦最终兵败自杀。本次兵变历时不足一天即被官军救平,曹吉祥被捕处死,曹氏家族及其党羽彻底覆灭。长期以来,“谋反说”是学界对此次兵变的主流观点^[2-5]。但迄今为止,绝少有学者注意到原始史料中的“谋反说”充满疑点,也几乎没有学者注意到清修《明史》对曹钦兵变“谋反说”的记载是经过长期的流传演变才最终定型的,而恰恰是这一记载为学界所普遍接受。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用“层累造史”说作一初探。

一、原始史料中的曹钦兵变及“谋反说”的若干疑点

《明英宗实录》和《天顺日录》是记载曹钦兵变最重要的原始史料。《明英宗实录》载:

天顺五年七月庚子,司设监太监曹吉祥及其侄昭武伯钦等反,命怀宁伯孙镗等率官军讨之,钦败死,执吉祥下狱……(初)会怀宁伯孙镗奉命征西,钦使其党掌钦天监事、太常寺少卿汤序,择是日天未明视朝遣将,钦欲以是时举兵入。先夕,召诸达官及其党群饮于家,厚赠

收稿日期:2016-05-21

基金项目: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明代‘曹石之变’新探”(2014ssxm37)

作者简介:杨德会(1989-),男,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史。

通讯作者:王秀丽(1969-),女,河北宣化人,副教授,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

之……达官都指挥使马亮等恐事败,自钦家逸出,走告恭顺侯吴瑾、广义伯吴琮……上即召吉祥,缒入宫城,锁系之,令皇城四门、京城九门毋开。顷之,钦以亮等逸出,知事泄,遂于中夜自往锦衣卫指挥同知逯杲宅,执杀杲,遣其党杀左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斫伤内阁学士李贤于东朝房。遂攻皇城,东、西长安门不得开,纵火焚之。^{[6]6777-6780}

《天顺日录》载:

内官吉祥居禁庭最久……天顺初……卖官鬻狱,渎货无厌。上初不得已而从其欲,后不能堪,稍疏抑之。吉祥辄怀异志,令其侄昭武伯曹钦纠集所恩之人谋为不轨。会兵部尚书马昂、怀宁伯孙鏜统官军往陕西杀贼,于五年七月二日早辞,钦等趁机欲杀马昂、孙鏜等,就拥兵入内为变。幸而孙鏜等先觉,二鼓时即报于内,禁门不开。钦兄弟与同恶者先诣锦衣卫指挥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斩其首,碎其尸。盖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后朝廷委任行事,且言钦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后分布于各禁门,待其开拥入。三鼓至门,钦兄弟四五人俱在东长安门……曹钦适至,见予不忍杀,连呼尊长,执予手曰:“毋恐。”斥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尽忠迎驾复位,今被逯杲谮毁,反欲相害。”提杲头示予曰:“诚为此人激变,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谁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请命。”钦曰:“就与我写本进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朝房尚书王翱处,借执笔写成。予拉翱同行,于门缝投进,钦见门不开,乃举火焚,且复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寻尚书马昂,得翱等解之……在吏部,当晚大雨不止,闻官军围钦等于其宅,尽诛之。予虑其胁从者不宁,即投本进入,请急宣圣旨,胁从者罔治,以安反侧之心。^[7]

两书的上述记载基本上将曹钦兵变的原委过程讲述得很清楚。在这里,尽管两书都将曹钦兵变定性为谋反,但是上述若干内容本身就不免与“谋反说”自相矛盾:

第一,曹吉祥叔侄谋反的动机不足,而且整个兵变的过程仓促混乱、疑点重重,与本应严密筹划的谋反行动迥然不符。对于曹吉祥谋反的动机,《天顺日录》载:“上(指明英宗)初不得已而从其欲,后不能堪,稍疏抑之。吉祥辄怀异志,令其侄昭武伯曹钦纠集所恩之人谋为不轨。”我们知道,国史上历代臣民谋反目的都在于帝制自为,但这里只是说曹吉祥对英宗不满而造反,未免显得动机不足。再就兵变全过程来看,首先,兵变尚未爆发就已经泄密;其次,曹吉祥本人被捕,“上即召吉祥,缒入宫城锁系之”。按照上述原始史料的记载,曹吉祥是准备在宫中与曹钦里应外合,但在逮捕过程中,曹吉祥却没有发动同党进行任何反抗就束手就擒,实际上从事后审判情形来看,宫中被捕者也只有曹吉祥一人,亦即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同党,仅凭曹吉祥一人如何能够里应外合?最后,兵变的整个过程也显得举措混乱、毫无章法,纵观史书,国史上所有谋反者无不处心积虑,作好周密的部署和长期的准备,并广泛联络内外官员,以图万全。按照谋反者的正常逻辑,擒贼先擒王,曹钦本应直接挥戈攻打皇宫,生擒或者杀死英宗,只有这样才能掌握主动权。但实情却是曹钦先杀死对于谋反成功与否无关紧要的逯杲、寇深,而后又胁迫大学士李贤为其草疏释罪,不果,最后才火烧宫门。纵观曹钦兵变的整个过程,正如台湾学者陈治平所说,“东奔西突,如同疯狂一般”^[8],从中我们看不出任何精心策划的痕迹,而且还浪费了极为宝贵的先发制人的时机。而对于曹钦胁迫李贤上疏的行为,学者们大多心照不宣地将其当成是砌词狡辩。但以常理来判断,假如曹钦果真蓄谋造反,还敢期待英宗因为一封奏疏而贸然相信吗?这未免太低估英宗的智慧了。

第二,李贤在兵变被镇压后立即向英宗上疏请求宽赦曹钦的胁从余党,这一点很耐人寻味。李贤作为一名浸淫官场多年的官僚,必定深知任何帝王对待谋反的态度都是零容忍,因而明代对待谋反者的基本原则是均不分首恶、胁从一律处死。尽管如此,李贤仍毫不迟疑地请求英宗赦免曹钦党羽,一个可能性极高的解释是他并不相信曹钦谋反,否则他不会不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就贸然行事,而这一建议事实上也立即被英宗所采纳,“命抚谕都人及保定等处达官凡为反贼所胁从者,无得惊疑”^{[9]6783}。

以上是专就引文部分的内容进行探讨,其余原始史料中还可以找出若干与“谋反说”方枘圆凿的

证据。

尽管英宗本人曾在公开诏令中一再声称曹吉祥“遽行反逆”^{[9]295}、“心怀怨望,谋为不轨”^{[9]297}。但从他对曹钦余党的处置来看,显然与此并不一致。如果说英宗赦免被曹钦胁从的余党可以被说成是宽仁,那么他处置曹钦兵变重要从犯的行为则无疑显示出其对待曹钦兵变的真实认知态度,“天顺五年七月癸丑,蔚州卫带俸都指挥赵旺、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侯通致仕……旺、通皆吉祥、钦腹心,同谋为逆”^{[6]6793}。此外达官都督同知也先帖木儿是曹钦余党,失败后“越城逃至通州民瓜田中盗食瓜,民欲殴之。也先帖木儿穷蹙吐实,民执送镇守官,械赴京,法司论当凌迟处死。上命锦衣卫禁锢之”^{[6]6786}。按《大明律》,“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主从,皆凌迟处死”^{[10]1301},英宗显然并未照此办理。实际上,被赦免者尚不止赵旺、侯通、也先帖木儿三人。《明英宗实录》载:“锦衣卫捕获反贼曹吉祥管家并同居内使张鉴等五十三名,奏请拟罪。上以其不知反情,悉宥之。”^{[6]6803}张鉴等人并未经过审讯,何以英宗能够断定他们不知情?这说明英宗早就心知曹吉祥根本没有策划谋反,故张鉴等人才不可能“知情”。又按《大明律》,凡与谋反者“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10]1301}。这里并未说明知情与否,然则即便张鉴等人不知情,仍要被处斩,但他们最终却逃过一劫。最离谱的是,即使是曹吉祥、曹钦这两个“谋反”祸首的直系亲属也仅仅只是被收监,最后被贬到各公侯伯家为奴而已,“以曹吉祥、曹钦等家属六十三名给配公侯伯家为奴,以久禁遇赦也”^[11],其他从犯自不必说。

二、“层累造史”的曹钦兵变“谋反说”

从上文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始史料中的曹钦兵变“谋反说”疑点重重。那么,它又是怎样被后世学者广泛接受的呢?这是因为曹钦兵变史实际上在明代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谋反说”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最终才得以在清修《明史》中定型。换言之,曹钦兵变“谋反说”的形成实际上可以说是“层累造史”的结果,依照时间顺序,由以下四个“板层”组成:

第一个“板层”是兵变过程的变化。按照《明英宗实录》《天顺日录》等原始文献的记载,曹钦先是杀遼杲、寇深,然后胁迫李贤上疏,最后才火烧宫门。如前文所说,这一行动顺序其实并不符合谋反的逻辑。因此,成化朝首辅彭时对兵变的记载,其过程就发生了“变化”,“辛巳年七月二日,昭武伯曹钦反……适朝廷遣兵部尚书马昂、怀宁伯孙镗征西。早朝,谋领达官突入为变。达官中有曰马亮者知之,夤夜,诣至恭顺侯吴瑾家言之。瑾以告孙镗,具本达于上。朝门未开,而反者至矣。杀遼杲并寇都御史,取其首,举火攻门,纵横于门外,势可畏,朝官多避匿不敢出”^[12]。在彭时笔下,曹钦先攻城门,而后才杀遼杲、寇深,举火攻门,最后才抓住李贤。比彭时稍后的黄瑜《双槐岁钞》对兵变过程的记载看起来更加符合“谋反”逻辑。“吉祥自石亨诛后,久蓄异图。时以七月二日出师,钦遂约吉祥为内应,并结达官都督伯颜也先等数十人作乱。是日,都指挥完者秃亮诣长安门告变。夜二鼓,宫中闻变,诏侍随中官执吉祥,以俟天曙。四鼓,钦举兵犯阙,捶杀锦衣指挥遼杲,击内阁学士伤首,并执吏部尚书王翱于东朝房。铎率数骑往西,杀左都御史寇深,斫伤广宁侯刘安,焚东西长安门及东华门,朝臣溃散”^[13]。在这里,曹钦先举兵犯阙,而遼杲和寇深则是被先后分开杀死。

第二个“板层”是“魏武之对”的出现,这是“谋反说”构造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谋反说”的成立与否具有决定性影响。据成化朝王铨的《寓圃杂记》载:

时(曹)钦已死,惟妻子贺氏为证,(冯)益故为自异,见贺加丑诋,贺不堪,曰:“冯先生不须多言,昔先生与钦坐中堂,钦问曰:‘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者乎?’先生云:‘曹操乃曹节之后,终成大事。’钦大喜,命妾佐酒……”^[14]

大约与王铨同时稍后,祝允明在《野记》中也有类似描述,内容则更加生动:

钦既败,捕其家人,讯同谋者,终不得。族已赤,独一妾贺氏在官……贺曰:“冯先生……

不记一夕,吾夫问:‘古有宦官家为天子者乎?’先生言:‘曹操乃曹节家,竟成帝业。’吾夫大喜,觞先生,尚命妾侑饮……”盖无语与贺对,斩于市。^[15]

两书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即王书称贺氏为曹钦“妻”,而祝书则说贺氏为曹钦之“妾”,据《明英宗实录》则王对祝错^[16]。祝氏与王氏为同时代同乡人,两人私交甚密,且曾为《寓圃杂记》作序。显然,祝氏必定详读该书,其记载失误并非无心之失,而是有着深刻的用意:试想,在理学鼎盛的明中前期,妇女公开抛头露面已属不当,贺氏身为正妻,为其夫的门客佐酒更是违反常识,令人匪夷所思。换言之,王书的记载使得曹钦谋反有了明确的动机,且人证俱在,但这个人证本身可靠性却值得质疑,而经过祝书由妻而妾的改动,则使得此事更为真实可信。

第三个“板层”是兵变人数增加。无论《明英宗实录》还是《天顺日录》,都没有记载曹钦兵变的具体人数,嘉靖朝的高岱所著《鸿猷录》称兵变的人数是“党羽不数十辈”^[16],稍后的邓元锡《皇明书》记载的人数则大大增加“(天顺五年)秋七月,太监曹吉祥及其兄子昭武伯钦谋反伏诛。始吉祥以杀石亨而惧……遂怀异志,不得间。钦遂谋与其兄都督铎、都指挥铉及达将等谋杀镗夺其兵,突入宫为逆,而吉祥为内应,合番汉兵五百”^[17]。

第四个“板层”是曹吉祥本人的权位大为提升。从国史上历朝大臣谋反的案例来看,凡谋反者无一是位高权重的重臣大将。因此,曹吉祥作为主谋者,他必须具有相当大的权势。但实情并不然。兵变爆发时,对于曹吉祥的实际官位,上引原始史料的记载都是司设监太监^[16]。而司设监太监在明代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冷衙门。曹吉祥在天顺朝初期的确一度声势烜赫,但天顺四年(1460)其政治上的盟友石亨下狱瘐死后,他的权势就直线下落,从天顺四年二月到五年六月兵变爆发前这段时间,曹吉祥叔侄在《明英宗实录》中连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显然已经被投闲置散,这对“谋反说”的成立无疑是极为不利的。于是万历朝尹守衡的《皇明史窃》对曹吉祥权位的记载一变而为“(兵变)时吉祥为司设太监,掌司礼者”^[18],明朝遗老万斯同的《明史稿》则再变为“论夺门功,升吉祥司礼监太监”^[19]。从二十四司中的冷衙门司设监太监变为权倾天下的司礼监太监,这个职位在明代的权势甚至还在内阁首辅之上。曹吉祥权位的提升无疑有助于提高“谋反说”的可信度。

正是在这样一个“板层”的不断叠加中,曹钦兵变“谋反说”才变得越来越翔实可信,形成了当代学者认知中的曹钦兵变史事的基本面貌。

三、明人对曹钦兵变“层累造史”的原因

曹钦兵变“谋反说”的最终定型是一个“层累造史”的典型案例,一如上文所见。那么,明人热衷于对曹钦兵变史事“层累造史”的幕后原因究竟何在?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0]意指历史研究只有在历史事件与现实生活有所联系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就曹钦兵变这一历史事件来说,由于它是一场宦官子弟发动的兵变,在明代宦官专权极为严重的情形下,曹钦兵变一事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为严重的朝代之一。实际上,明代宦官干政已经形成制度,且在相互制衡的前提下与内阁交互执掌相权。刘晓东教授将明代政治的这一特征称之为“监阁共理”体制^[21]。这一局面当然是自尊心极强的文官士大夫们所无法接受的,他们在现实政治中无法打倒宦官,于是就用手中的史笔作为武器来加以报复,同时用来向皇帝警告宦官专权的危险性,“以古为鉴”本来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悠久传统之一。因此天顺以后,尽管时过境迁,士大夫们却从未停止“关注”曹钦兵变,不断对其加以传播改写,所谓“不为其事而作也,为时事而作也”^[22]。究其原因,正如上文所说,原始文献中支持“谋反说”的证据过于匮乏,且又存在诸多疑点。这就使得其记载难以令人信服。为弥补这些“缺陷”,明人自觉地对原始文献中的“简陋”之处予以“修饰”“补充”,使得“谋反说”逐步变得完善起来。正如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所说:“顾彼亦岂欲为此诬枉之事乎!正为彼之意向如此,不说无以畅其胸中

也。”^[23]由于明人对曹钦兵变“谋反说”的构建已经十分完备,因此当清修《明史》时尽管纠正了明史上的其他诸多冤案,但对于曹钦兵变却仍然基本采纳了明人“层累造史”后形成的“谋反说”。挟官修正史之威,《明史》对“曹钦兵变”的观点更成为当代绝大多数学者的基本认知。

参考文献:

- [1]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
- [2]张廷玉.明史:第30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7775.
- [3]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152.
- [4]王毓铨.明时期[M]//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368.
- [5]南炳文,汤钢.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47.
- [6]陈文.明英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7]李贤.天顺日录[M]//邓士龙.国朝典故:第4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132—1134.
- [8]陈致平.明史[M]//陈致平.中华全史:第8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138.
- [9]不著译者.皇明诏令:第14卷[M]//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第45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0]不著译者.大明律集解附例.刑律[M]//明代史籍汇刊:第15种.台北:学生书局,1970.
- [11]李东阳.明宪宗实录:第2卷[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6.
- [12]彭时.彭文宪公笔记[M]//邓士龙.国朝典故:第7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590.
- [13]黄瑜.双槐岁钞: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63.
- [14]王圻.寓圃杂记: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82.
- [15]祝允明.野记[M]//邓士龙.国朝典故:第3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550.
- [16]高岱.鸿猷录:第11卷[M]//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第3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49.
- [17]邓元锡.皇明书:第6卷[M]//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第3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94.
- [18]尹守衡.皇明史窃:第25卷[M]//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第3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3.
- [19]万斯同.明史:第405卷[M]//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第33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80.
- [20]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傅任敢,译.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5.
- [21]刘晓东.监阁共理与相权游移——明代监阁体制探赜[J].东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哲学版,1998(4):54—60.
- [22]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M].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911.
- [23]孟姜女故事的转变.顾颉刚[M]//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0.

The Study of Change of Cao Qin Mutiny in Ming Dynasty

—A Typical Case of “History of Layer Accumulation”

Yang Dehui, Wang Xiul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Cao Qin Mutiny, which broke out in the Tianshun period of Ming Dynasty,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conspired rebellion launched by Cao Jixiang and his nephew Cao Qin by most of the historians. However, the original documents, like *Ming Ying Zong Shi Lu*, has so many doubts threat the credibility of the so called “Rebellion”. Therefore, historians of Ming Dynasty constantly rewrote the story of The Cao Qin Mutiny. Because of that, the story of The Cao Qin Mutiny can be considered as a typical case of “History of Layer Accumulation”, the political reason is the main reason why Ming people committed to studying of story of The Cao Qin Mutin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Cao Qin mutiny; the opinion of rebellion; History of Layer Accumulation

(责任编辑 张春生)